

## 第十章

# 色拉寺事件

中央對此次事變，僅有電報三通，藏政府對之置若罔聞，親華派分子對中央此種處置，頗表不滿，認為如待達扎將西藏親華派完全消除，屆時中央再謀西藏問題之解決，較今當萬分艱鉅，而在藏之政府工作人員，亦將無法立足。且以熱振因親華而發生此事變，中央似應迅即派兵入藏，則西藏問題即可解決，國防亦得因而鞏固。<sup>1</sup>

1947年春，當國共雙方在東北和華北各地的激烈角逐引起全國關注，西藏發生了一起未遂政變。當年1月，西藏攝政達扎仁波切一名親信的家裏收到一個匿名小包裏，當時並未在意，數週之後，當家人打開，發現有個弧形金屬物。這個金屬物開始吱吱作響，隨即爆炸。西藏政府懷疑的主要對象是前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一般認為他正陰謀反對達扎的統治。

4月14日，一個與熱振有關聯的寺院及其他幾個被懷疑的家族遭拉薩政府封鎖。不久，拉薩政府逮捕了熱振及其他前政府官員在內的懷疑對象。兩天以後，4月16日，與熱振關係密切的色拉寺僧人宣佈支持前攝政。他們刺殺堪布與其他達扎任命的寺院官員，並在隨後一段時間給拉薩造成嚴峻的挑戰。色拉寺僧聯合其他寺院的僧人，武裝起來，轉到一個山脊上，但在那裏受到政府軍山炮的攻

擊。色拉寺與拉薩政府會談多次，但並不成功，拉薩政府進一步轟炸。4月27日，達扎政權決意進攻，殺害大量叛變僧人，迫使餘下的多數投降。與此同時，西藏政府對熱振及其嫌疑盟友展開調查，據西藏政府表示，熱振盟友後來承認他們涉及陰謀反叛。另有傳言稱，熱振呼圖克圖與國民政府有瓜葛，後者曾秘密支持他謀反。1947年5月8日，前攝政在獄中去世，西藏官員說，熱振自然死亡。<sup>2</sup>

1947年拉薩與色拉寺的衝突本質上是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最大的內亂，事件仍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例如，政變的原因是甚麼？西藏前攝政熱振呼圖克圖是否確實與漢人合謀造反？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干預了西藏的政治事務？當知悉西藏這個史無前例的事件後，蔣介石及其幕僚如何反應？或打算怎樣反應？就中國的邊疆與少數民族議題而言，色拉寺事件有何後果？本



圖10-1 熱振呼圖克圖(約1940年)，1934至1941年間任西藏攝政，被中國的歷史學家描述為一個「親漢」的人物。經允許複製自孫子和：《西藏史事與人物》，圖7。

章將討論這些有待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不論是對國民政府的西藏問題，還是對當代漢藏關係而言，色拉寺事件均有深遠影響，不容忽視。本章將進一步提出，二戰後國民政府試圖加強在西藏權威的努力，在色拉寺事件後災難性地結束。另外，此次事件後，漢人在西藏的勢力遭到徹底的打擊，幾乎全面撤退，影響所及，195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為了將西藏這塊土地納入中國堅定控制之下，除了採取極端手段之外，別無選擇。

## 國民黨政府在西藏的秘密工作

先談國民政府在西藏的情報活動。抗日戰爭迫使蔣介石政府從東南沿海轉往內陸。中國西南與西藏在地理上的接近，以及國民政府政權在西南方相對鞏固的地位，給蔣介石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可以自1928年以來第一次在西藏邊界之內佈置情報網絡。一份1939年蒙藏委員會的戰時計劃揭示，國民政府不僅準備擴大戰前設在青海、阿拉善、鄂爾多斯、西康的現有情報點，還準備在雲南西部、新疆與西藏設置新情報站。<sup>3</sup>由於1940年吳忠信擴大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規模，進一步提供了一個合法藉口，讓重慶得以派遣更多工作人員前往西藏。至1943年，國民政府的兩個主要情部單位，即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軍令部第二廳，已分別在西藏建立據點。據一份自傳資料披露，拉薩幾乎所有擔任重要職位的中國人，如國立拉薩小學校長、無線電台台長、氣象局局長，都是中國的特工。國民黨政府在西藏行事的秘密活動，目標有兩個：一是在全西藏建立一個穩固的情報網絡，並盡量招募大量當地人為其政權服務；二是提高國民政府與親漢人的派系之間的聯繫，以對抗西藏政府日益脫離中國有效控制的努力。<sup>4</sup>

1941年後，當熱振呼圖克圖從攝政位置退下來，培養親漢派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目標。在1934至1941年攝政期間，熱振允許兩

個重要的中國使團，即1934年的黃慕松使團與1940年的吳忠信使團前往西藏。吳忠信對西藏的高調訪問甚至給中國帶來一個巨大宣傳上的勝利，他們宣稱國民政府「主持」了新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典禮。熱振還允許國府在拉薩設立代表處，並樂於接受國民政府給予的諸多尊貴頭銜與慷慨禮物。因此，他不僅被1940年代的中國媒體、也被過去數十年中國的歷史著作描述為一個「親漢」的西藏人物。<sup>5</sup>

1941年1月，熱振突然宣佈辭職。據漢文原始材料顯示，熱振向國民政府解釋說，「占卜預言」指他會有災劫，除非他辭職並隱退一段時間，否則生命堪虞。與此同時，熱振告知重慶，曾任他經師的達扎仁波切會繼任。在一封致重慶的電報中，熱振向國民政府保證，中國與西藏的現有親密關係將會維持不變。來自拉薩的國民黨消息還顯示，熱振辭職只是暫時的。熱振與達扎之間訂有秘密協議，熱振會於三年後復職。<sup>6</sup> 1941年2月底，年邁的達扎成為西藏攝政，熱振及其隨從返回拉薩北部的熱振寺，直至1944年12月，未再返回拉薩。

與熱振的保證及國民政府的希望相反，達扎執政期間，漢藏關係變得非常緊張。如同前面第七與第八章所述，戰時拉薩的一些政治活動，比如成立外交局、反對就中印公路問題與中國合作，以及諸如孔慶宗事件等意見相左，導致雙方產生敵意，此絕非當時忙於抗戰的國民政府所樂見。1943年，當就西藏新的政治局勢作出回應時，蔣介石親自下令在財政上與政治上支持邦達饒幹的西藏革命黨。蔣還特別下令在西藏和印度北部工作的特工與饒幹及其盟友全面合作（見第八章）。<sup>7</sup> 通過整合各種反對西藏當局的零散力量，國民政府向達扎控制下的拉薩政府施加更多政治壓力。

除了給予饒幹及其同伙秘密支持，中國的國防官員還考慮用其他手段支持西藏的親漢勢力。例如，1944年擔任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的沈宗濂，任內積極與索康扎薩 (Surkhang Dzasa) 交好。

索康扎薩當時為西藏外交局局長，其子索康·旺欽格勒 (Surkhang Wangchen Gelek) 後來成為噶倫。沈宗濂預計他們最終會成為西藏政壇上最有權威的人物。1946年上半年，沈宗濂試圖重組噶廈，以索康為司倫，其職位僅次於達扎攝政。<sup>8</sup> 沈宗濂還竭力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家庭成員發展友好關係，比如其父堯西公 (Yabshi Kung)、其兄嘉樂頓珠 (Gyalo Thundup)。1946年初，沈宗濂成功地說服堯西公讓嘉樂頓珠前往中國內地學習。不久之後，沈宗濂進一步安排嘉樂頓珠與達賴喇嘛的姐夫黃國楨 (Phuntsok Tashi) 秘密前往中國。當達賴喇嘛的家庭成員抵達南京的消息傳回拉薩時，達扎政府與英國皆極為震驚，對沈宗濂在拉薩的活動十分警惕。<sup>9</sup>

儘管能幹的沈宗濂努力吸引重要西藏人物靠攏中國，多數國民政府高官卻將希望押注在前攝政熱振呼圖克圖身上。當二戰即將結束時，熱振對西藏的政治影響力不容忽視。這個事實在1945年5月召開的第六屆國民黨代表大會上展現出來。蔣介石以國民黨領袖而非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親自邀請熱振訪問南京，參加即將舉行的大會。當然，由於重慶與拉薩之間的複雜政治關係，熱振無法出席。但蔣介石仍然希望熱振可以派兩名私人代表前往戰時陪都。由於來自達扎政府的巨大政治壓力，後者的建議亦不可行，於是蔣介石決定任命熱振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這個任命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政治象徵意義。<sup>10</sup> 國民政府決策者顯然普遍相信，熱振不久將恢復權力，但事實並非如此。

## 熱振與達扎衝突

出乎意料的是，熱振呼圖克圖所栽培的新攝政王不僅遠離其前任，而且從一開始就沒有對熱振的支持者表示出偏袒與好感。舉例而言，1943年初，因些微失誤，達扎對熱振的一個支持者做出降職處分，並以夏格巴取代其職務，夏格巴是達扎的支持者，當時仍是

噶廈的低級官吏。與此同時，噶廈中的噶倫位置出現空缺，達扎任命對熱振一派存有敵意的旺欽格勒擔任此職。隨後，西藏政府上層的人事出現重大變動，反熱振的人取代了親熱振的官員。<sup>11</sup>儘管如此，熱振仍決意返回拉薩，恢復其攝政職位。他的追隨者再三告訴拉薩的英國人，前攝政希望重新執政。<sup>12</sup>1944年12月，熱振及其隨從前往拉薩，伴隨着盛大的儀式。根據一份英國目擊者的敘述披露，他以回歸攝政的姿態受到隆重的迎接。一些親熱振的官員甚至從拉薩出發，經過兩天的旅程，前往與他會面，接待帳篷設在拉薩東邊一英哩之處，政府官員與達賴喇嘛的家庭成員皆聚在那裏迎接他。拉薩大部分人曾一度相信，達扎很快退位。<sup>13</sup>

1945年1月，熱振與達扎在布達拉宮會見，但此次見面對熱振而言並不愉快。據有關會面的西藏資料顯示，熱振先向達扎表示自己已沒有生命危險，然後說達扎年邁，難以勝任攝政職務，這是他返回拉薩的原因。但是，達扎卻無意退位，如同傳言中的1941年兩人協議那樣，達扎沒有即時回應，也沒打算跟熱振進一步談話。<sup>14</sup>熱振對達扎表現出來的冷淡與蔑視，既惱怒又難堪，不久便返回熱振寺。

當達扎政權與熱振所屬的色拉寺在一次兇殺事件中發生衝突時，熱振與達扎的關係進一步惡化。1944年底，一群色拉寺僧人前往拉薩北部的林周宗 (Lhundrup Dzong) 去徵收稅糧。由於無法成功收稅，一群林周宗的農民找宗政府幫助。這位宗政府的長官是達扎的支持者，他向色拉寺僧人表示，若無拉薩的命令，不得再去收稅。收稅的僧人返回色拉寺，向堪布阿旺嘉措 (Ngawang Gyatso) 匯報此事。這位堪布是熱振的親密盟友，他指示徒弟不惜任何手段，包括賄賂，以取得宗長官的合作。宗長官不為所動，遭惱怒的色拉寺僧人打得不醒人事，幾天後便去世了。<sup>15</sup>

1945年1月，由於擔心拉薩當局會捉拿他們的代表並逮捕肇事僧人，色拉寺拒絕參加拉薩舉行的新年傳召大會。西藏政府不能

容忍色拉寺這種對抗行為，特別是年輕的達賴喇嘛首次參加這個儀式，如果色拉寺不出席是對達賴喇嘛極大的冒犯。為游說色拉寺僧參加大會，避免在新年期間發生動亂，噶廈通知色拉寺，如果他們如往常般參加，傳召大會期間便不會逮捕任何僧人，衝突將於4月再予解決。色拉寺由於相信自己已經取得勝利，僧人不會為稅糧徵收衝突而受到懲罰，寺內重要人物出席了1945年2月的傳召大會。<sup>16</sup>

拉薩政府絕不願就兇殺事件對親熱振的僧人從寬發落。實際上，達扎尋找機會，對「目中無人的」色拉寺寺院施加進一步權威。1945年6月初，拉薩突然命令解除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和其他幾位僧官的職務。經過內部討論，阿旺嘉措及其隨從決定在達扎逮捕他們之前，逃往康區或中國內地。<sup>17</sup>當拉薩發現色拉寺堪布逃走，立即派士兵前往捉拿歸案。阿旺嘉措偽裝成普通的朝聖僧人，成功逃到中國控制的西康，然後經甘孜與德格，於1946年初到達重慶，受到國民黨官員的熱烈歡迎。但是他的隨從包括他的兩位兄弟，卻遭逮捕並於途中被殺。<sup>18</sup>西藏政府決定，所有與林周宗事件有關的僧人必須捉拿歸案，將他們流放至西藏北部或西部偏遠的地方。此外，色拉寺擁有的、用於防衛的彈藥皆被沒收。達扎後來任命了他最親密的盟友為色拉寺新的堪布。<sup>19</sup>林周宗事件是隨後兩年衝突的起點，並最終導致1947年的未遂政變。

## 國民政府對熱振—達扎衝突的反應

熱振試圖重新獲得權力未遂，帶着深深的沮喪與恥辱，返回了寺院。此後，熱振加強與國民政府的秘密聯繫。在一次與西藏的國民黨情報人員的談話中，熱振公開要求蔣介石幫助他推翻拉薩現政權。他催促中國派部隊直接到拉薩，以幫助他謀反。熱振建議，如果中國部隊不能推翻拉薩現政權，南京至少應該將中國部隊調到邊境地區，以示支持。如果這些行動皆不可能，熱振希望中國至少向

他提供必要的武器，比如來福槍、機關槍與子彈，以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為感謝國民政府的幫助，熱振承諾，一旦成功重新執政，他的新政權將立即宣佈加入中華民國，承認中國的主權。<sup>20</sup>

熱振的提議立即引起蔣介石的注意。當收到熱振的信息，蔣介石要求蒙藏委員會與其高級軍事幕僚仔細分析。儘管蒙藏委員會與國民政府軍事官員一致同意應繼續給親漢的熱振派秘密的支持，卻不建議對達扎政府立即採取軍事行動。<sup>21</sup> 領導層不願公開支持熱振可以理解，因為幾乎同時，達扎政權決定派出自1911年以來的第一個官方代表團訪問中國內地。南京高層曾一度相信，由於抗日戰爭勝利的光環，西藏現政府願意與漢人政府合作，進一步將西藏整合到中國的領土與政治舞台中去。因此，這些國民政府官員認為，捲入達扎與熱振的衝突，並與拉薩發生任何不必要的敵意，皆是極不明智的。蔣介石對此表示贊同。例如，儘管他允許阿旺嘉措留在重慶，但卻嚴格命令國民政府情報部門秘密地「仔細保護」這名西藏流亡分子。在此階段，蔣介石決定把阿旺嘉措給藏起來，以免引起拉薩的猜疑。<sup>22</sup>

1946年中，國民政府的政策變得更為明顯，包括與達扎政權進一步合作，而對熱振的謀反只給予冷淡回應。7月，由於想獲得中國的確切支持，熱振派兩名私人代表經西康前往中國，希望會見蔣介石。這兩位信使在四川受到秘密接待，與劉文輝及後來成為行政院院長的四川省主席張群進行了會談。<sup>23</sup> 張與劉皆對熱振的行動表示同情。劉文輝甚至告訴西藏信使，如有必要，他可以調動部隊至康藏邊界。<sup>24</sup> 但是，當熱振的私人代表準備前往南京時，蔣介石卻指示張群加以阻止，讓他們留在成都。蔣解釋此舉是為避免引起達扎代表團的懷疑，他們當時正在南京，準備出席遲遲未能開幕的國民代表大會。<sup>25</sup>

由於首次有西藏來的代表團參加南京重要的政治會議，國民政府高層異常興奮，因此沒有認真對待熱振的警告。在一封致蔣介石



的私人信函中，熱振警告國府領袖，達扎政權絕不會甘心接受國民政府的統治，當時西藏代表最終會向南京提出遠遠超過國民黨「高度自治」方案的政治要求。熱振再次強調，防止西藏進一步從中國領土分離出去的唯一辦法，是支持他重奪攝政職位。<sup>26</sup> 值得提及的是，在此前後，調查統計局是唯一一個大膽地向蔣介石提出如下建議的政府機構，即他或需重新調整中國對西藏領導層的策略。他們提醒蔣介石，儘管南京優先考慮的是與拉薩現當局的聯繫，但中國仍然應該拿出更多資金支持熱振一派，如此，熱振便可以通過賄賂，盡可能爭取更多在西藏現政府中任職的西藏官員的支持。<sup>27</sup>

大概因為受到蒙藏委員會幕僚的影響，後者認為他們已經做出極出色的工作，說服西藏派人出席國民代表大會，從而不贊成與熱振更緊密的合作，蔣介石後來怒斥情報人員不要干預太多政府的西藏事務。蔣介石指示他在西藏的特工不要干涉西藏前攝政與現攝政之間極為敏感的矛盾衝突。<sup>28</sup> 1946年秋，對於熱振反覆提出的請求，蔣介石只承諾當熱振面臨危險，中國政府會設法保護其生命與財產安全。<sup>29</sup> 不過，國民政府官員隨後甚至連這個承諾也沒能克守。

甚至當在西藏與印度的情報活動遭受巨大挫折時，南京對西藏內部衝突的態度也沒有改變的跡象。1946年4月，英國駐江孜商務代辦截獲了一個從拉薩寄給時在噶倫堡從事西藏革命活動的包裹，裏面有地圖與文字記錄。英國官員對郵件產生懷疑，通知了噶倫堡的印度警察，印度政府指令嚴密觀察饒幹及其同伙的行動。後來，印度官員驚訝地發現，饒幹命人印刷了4,000份西藏革命黨成員表和2,000枚成員卡。4月10日，英國把饒幹組織的存在通知了西藏政府。<sup>30</sup> 拉薩立即要求印度政府引渡饒幹回藏，但印度政府更願意將他驅逐回中國。6月9日，英國突然搜索懷疑從事反西藏政府間諜與革命活動的饒幹及其同伴的房子。據漢文資料顯示，國民黨官員已經警告饒幹，印度的可能襲擊，令他毀掉所有與西藏革命黨有關的文件，特別是成員名單。但是饒幹還是掛萬漏一，被印度警察有所

發現。<sup>31</sup>隨後不久，印度政府對饒幹及其追隨者發出了驅逐令。

饒幹試圖留在噶倫堡，聲稱自己是中國人，正式身份是蒙藏委員會「專員」。但是，國民政府顯然未能說服新德里撤銷命令。因此，饒幹被迫於1946年7月19日返回中國。<sup>32</sup>與此同時，拉薩的中國官員竭力讓西藏人相信，饒幹屬個人行動，跟國民政府與西藏革命黨毫無關聯。<sup>33</sup>當西藏質疑饒幹持有中國官方稱謂時，蒙藏委員會回應稱，他僅是幫忙「將孫中山先生的著作譯成藏語」，並沒有官方職位。南京官員還稱，饒幹具有中國的官方稱謂，「純粹為方便他獲得護照，而非任何官方職位」。<sup>34</sup>拉薩沒有就此事繼續糾纏。但是，這對國民政府在西藏的秘密活動是一個沉重打擊，饒幹的秘密政黨在中國幫助下所設立的情報網絡，經此一役破壞殆盡。不過，饒幹事件並沒有窒礙西藏代表團訪問中國的行程，南京顯然仍對隨着代表團而來的官方接觸抱有很大期待，這個期待不是針對熱振集團，而是針對達扎政權。

## 拉薩政變與色拉寺叛亂

當戰後中國首個國民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之時，西藏的政治形勢異常緊張。由於相信熱振集團威脅其地位及政府的穩定，達扎抓緊機會除掉政府中親熱振的支持者，改以親達扎的人士取而代之。1946年12月，噶倫中唯一同情熱振的彭康噶倫(Phünkang Shape)被達扎解除職務。其結果，至1946年底，噶廈的四個噶倫，包括索康·旺欽格勒、夏格巴、噶雪巴與新任命的拉魯(Lhalu)，要不強烈地親達扎，要不改變了政治立場，向達扎效忠。<sup>35</sup>另一方面，自林周宗事件以後，從屬拉薩寺院的熱振支持者不斷地催促熱振採取行動，反抗達扎的肅整。熱振的個人回憶錄揭示，追隨者計劃於1946年底當達扎從拉薩前往私廟時行刺他。但是策劃者未能及時組織，熱振的支持者於是決定在1947年初達扎出席拉薩的一個傳統節日期